让大师智慧照亮未来

7月11日，一个哀恸的早晨。

4时30分，北京医院，93岁的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；4个半小时后，在301医院，98岁的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。

“风雨百年，铸造的是品格；大浪淘沙，沉淀的是真金。”两天来，在国家图书馆报告厅，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，两位先师的灵前，浩瀚的花海、无言的泪水倾诉着人们的追思。在网上、在手机短信里，国人以自发的形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悼。

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”半个多世纪前，臧克家曾以诗歌道破生命的真谛。今天，两位大儒以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襟怀与器识，再次印证了生命的力量和价值。

学 问

2005年4月14日，经本人再三请求，任继愈先生终于从担任了18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，那天，正是他89岁生日的前一天。

“仿佛一转瞬间，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，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，要向期颐进军了。”8年前，季羡林在《九十述怀》中感慨：“我现在一方面眷恋人生，一方面又觉得我活得太久了，活得太累了，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。但是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，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，向前走。”

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征程中，偶或相遇，偶或偕行，在不同的轨道上，他们奋力“向前走，向前走”。

“我身体很好，能吃饭，能工作，精神好，还能给国家做事。”季羡林乐呵呵地说。任继愈年轻时喜欢运动，晚年依然身体健朗、精神矍铄。然而，岁月不饶人，2005年，因长年俯首书海，任继愈患了严重的眼疾。几乎是同时，季羡林安装了心脏起搏器；2006年，又做了左腿骨髓炎手术。

但这都没有让他们“向前走”的速度有丝毫减慢。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。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，这种以使命和责任为发端、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，决定了两位大师淡泊名利、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风格。在喧嚷浮嚣的世风中，两位年过九旬的大师愈加散发出陈酿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。

“以理想滋润生命，以生命护持理想。”作为哲学大师熊十力的弟子，任继愈坚信，学问的生命与理想来自浩浩荡荡的文化传统，“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，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。”

“沙滩银闸忆旧游，挥斥古今负壮猷，履霜坚冰人未老，天风海浪自悠悠。”这首诗是任继愈与大学同窗胡绳共怀昔日往事的唱和之作，磅礴之气跃然纸上。几十年来，他始终如一地为少年时所负“壮猷”孜孜矻矻，不懈努力。

“我现在目标是要活到150岁。因为中国国富了，民也强了，经济、科技都发达了，‘神五’、‘神六’也上天了，我要再多活几十年，活到150岁！”季羡林乐观地说。

九旬以后，任继愈的眼疾愈发严重，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，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，但是他仍然将每天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，“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时光，应该多做些事情，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光阴。”他说。为此，他幽默地将自己的书房由“潜斋”改称“眼科病房”。

正是因着这种勤奋，十年浩劫中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的间隙里，季羡林翻译出了闻名世界的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。9万余椎心泣血的诗行，写下中国文化史浓重的一笔，树起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。正是因着这种勤奋，1983年，70多岁的季羡林从一本《弥勒会见记》残卷开始，以10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，以中、英文写成专著，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。

20世纪90年代，80多岁的季羡林的婶母、女儿、夫人、女婿相继离开了他。他变得更加沉默，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《中国蔗糖史》的研究和写作上。这是寂寞的10年，“在80岁到90岁这个10年内……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，值得玩味。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，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，风雨无阻，寒暑无碍。燕园风光旖旎，四时景物不同。春天姹紫嫣红，夏天荷香盈塘，秋天红染霜叶，冬天六出蔽空。称之为人间仙境，也不为过。在这两年中，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，可是我都视而不见，甚至不视不见。未名湖的涟漪，博雅塔的倒影，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，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、懵然、无动于衷。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，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。”

在不同的轨道上，他们心心相印；在相同的追求中，他们携手向前。乐观、顽强，一次次逼退苦难，一次次与病魔对峙，与20世纪的风风雨雨相比，他们强硬得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翁。“生也有涯，学无止境”，在一幅法书作品中，任继愈写道，正是在这无涯的学海中，他首次提出“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”，从而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“中国古代无宗教”的普遍观念。“学问不问有用无用，只问精不精”，季羡林曾这样答问。“焚膏继晷，兀兀穷年”，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、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。正是在这精进的求索中，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：中国文化体系，印度文化体系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，自古希腊、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，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，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。

季羡林

任继愈 (资料图片)

爱 国

“道之将废也，文不在兹乎？”任继愈曾以此句总结20世纪中西文化接触之后，中国有识之士对社会变革与国家命运的深刻反省。

“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，它与‘五四’以后的变革相比，简直微不足道。”任继愈说，“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，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，连带引起社会生活、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。”

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在两位大儒的履历中，有着太多的不同，又有着数不清的相似，以学问报效祖国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，这是他们勤勉治学、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。“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，还是作为一名学者，第一位的是要爱国。”这句话是任继愈的“口头禅”。“平生爱国，不甘后人，即使把我烧成灰，我也是爱国的！”这是缠绵病榻的季羡林的铮铮话语。

1991年，季羡林曾写过一篇《八十述怀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深情地“回头看”——“在灰蒙蒙的一团中，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，路极长，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，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。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，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，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。这条路延伸出来，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。这条路又延伸出去，我看到了水木清华，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，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。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，我看到了红楼，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。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，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。再看下去，路就缩住了，一直缩到我的脚下。”

20世纪初叶，齐鲁大地的共同成长背景，为季羡林和任继愈生命最初历程剪出相似的轮廓。1911年8月6日，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，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。1916年4月15日，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。那时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，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百日维新……知识分子在沧桑时代背景下试图寻找中华民族命运的最新答案。从识字到上小学，任继愈换过很多地方。“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，眼前没有红，没有绿，是一片灰黄。”季羡林说。

1930年，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，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，专业是德文。1934年，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，师从汤用彤、熊十力、贺麟、钱穆诸教授。两所大学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的治学传统和勤奋、严谨、求实、创新的学术风气，为他们的学术道路夯下坚实的基础。1935年，季羡林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，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、佛学、印度学。“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，”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，“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。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，或能有所发明。”而随着北大南迁的任继愈，则在风餐露宿的迁徙中，“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，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”。“人生的归宿，最后的真理，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？”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后，面对破碎的山河，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。

求学背景不同，人生轨迹不约而同地相合。新中国成立之际，两位年轻学子便投身到塑造中华民族思想的大业中。1942年，任继愈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。1945年10月，季羡林经瑞士东归，1946年到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。

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说，“他们像是不知疲倦的导读者，以自己对祖国的思考、对民族的期待、对生命的真诚，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征程中，引领人们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大门。”

修 身

“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”曾有学生问任继愈。他沉思良久，缓缓答道：“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。”古人云：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任先生在80岁时，却特地请人治了一枚印章，只六个字：“不敢从心所欲。”

6年前，季羡林住进北京301医院。6年多的时间里，季羡林经历了心肌衰竭、左腿骨髓炎、心脏病的考验。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，他写下了20多万字的《病榻杂记》。在这部书中，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第一次阐明了他对这些年外界“加”在自己头上的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界(术)泰斗”、“国宝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——请人们把“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”。

“不敢从心所欲”，不是虚伪；“三辞桂冠”，不是作秀。这是任继愈、季羡林自谦和清醒的体现。勤勉治学半个多世纪，学贯中西，融会古今，德高望重，任继愈与季羡林堪称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、国学大师，却都对自己有着谦逊的评价。

“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，我算什么大师？我生得晚，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，不过是个杂家，一个杂牌军而已，不过生得晚些，活的时间长些罢了。我写的那些东西，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，小品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，哪里称得上什么‘家’？”季羡林说。在“大师”汹涌的年代，这种清晰的自省弥足珍贵。

“一辈子不做挂名主编”，这9个字是任继愈的“任上宣言”。1987年，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。在卷帙浩繁的学术长河中，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事。对于古籍文献整理，他有着自己的原则。从做选题、写提纲到审读点校，他总是亲力亲为，从不做“挂名主编”。107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《中华大藏经》花费了他10余年的宝贵光阴，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。煌煌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《中华大典》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，任先生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，工作也已进行了10年。据他的学生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说，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，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，任先生却很认真，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、费心费力。

朴素的真理从朴素的生活开始，朴素的追求也一定会到达朴素的目标。北大的学子都知道，朴素的季先生常年一身旧中山装，一双布鞋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因为这身打扮，他常常被误以为是学校的校工。一次，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，请他照看行李，他慨然答应，等到开学典礼上季羡林登台讲话，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。

“我做人的标准是朴实、真实，一个人不要天天耍花腔，也不要一天愁衣服少了，一天愁好东西吃得太少了，我不要一个人这样子，人活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吃饭、穿衣，一个人为了吃饭穿衣而活着，这个人格儿不高。”一生信奉朴素、对自己过于苛刻的季羡林，对于别人却从不吝啬。2003年末，在301医院住院的季羡林把爬格子所得的15万美元稿酬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。在此之前，他把自己的图书、手稿以及所收藏的宋代名人绘画等个人收藏品捐给了北京大学。“摆在国家手里最放心。”

季羡林说过，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：质朴，淳厚，诚恳，平易；骨头硬，心肠软；怀真情，讲真话；不阿谀奉承，不背后议论；不人前一面，人后一面；无哗众取宠之意，有实事求是之心；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，而是多为别人考虑；关键是一个“真”字，是性情中人。

“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深受大家热爱的原因在于，他们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。”古典文学家、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说。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，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，坚毅的气节和情操；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，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，开放创新的意识；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他们身上。韩经太说：“所以，他们能够做大学问，成大事业，有大贡献，他们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旗帜和榜样。” 据《人民日报》

时政点击

官民沟通是一个时代课题

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先生敢为官员先，以实名网友的身份在凯迪社区就昆明“处女卖淫案”和各路网友PK交流，数日间应者如潮。七八个回合下来，伍皓感慨如是：官民沟通的新路还是很艰难！

“官民沟通”顿成时政论坛的网议焦点。中医有个朴素的说法叫“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”。用这一说来解释社会关系、官民关系，倒是比用来做病理解释更加贴切。感叹“官民沟通艰难”，其实是在“喊痛”，喊的是社会之痛、时代之痛。访民在感叹，网民在感叹，伍皓等“一小撮”官员也在感叹，有痛感的不仅是草民。忧患意识较强的官员也“遥感”到了痛痒，觉察到有一种名叫“不通”的“时代病”，会影响他们整个群体的命运。

有些官员正视、倾听了，反复掂量之后，也认为只有限制公权与公仆方能减轻民间伤痛，方能让全社会“可持续负担”。体制内也存在理想主义者，公理正义或“修齐治平”等观念在他们内心或许还占据着一定位置。“理性现实主义”和“道德理想主义”这两类体制内人士，怀抱客观上利民的“深化改革”或“适度改良”的愿望，无论从“治国政绩”还是“个人功业”的角度考量，进行“官民沟通”都是他们的当务之急。

他们的视野比“混体制分子”宽广深远，知道强撑的办法毕竟不是个长久办法，知道每个微弱声音的背后都有一股微弱的力量，而这种力量即便是零星散乱的，只要覆盖广度临近宏观界面便足以消解“上层建筑”赖以矗立的基础。对这些体制内有识之士，公众也不指望他们担保国民的幸福光明前途，但是，与他们的沟通可以带来降低破坏与伤害程度的效果，这一点却可期、可信。因此，对他们发出的“官民沟通”信号，广大的“民间人士”有理解、响应的必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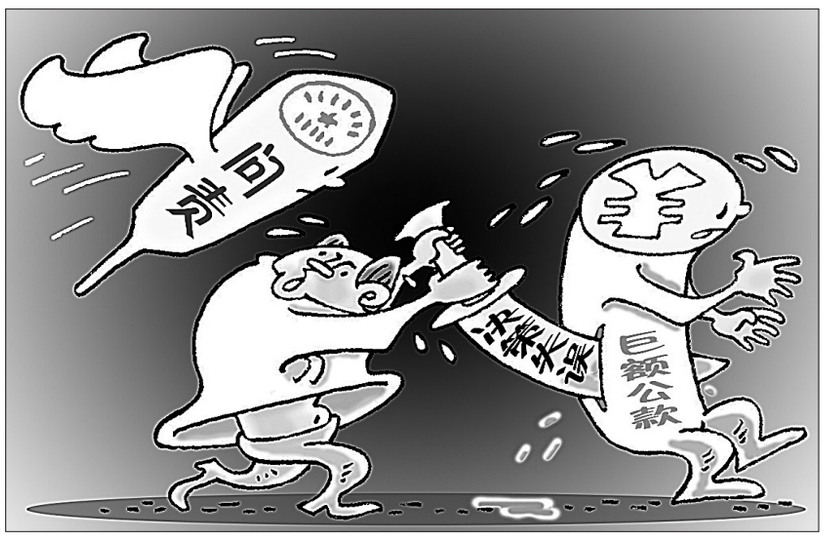
在探索“官民沟通新路”之前，走过一条失败的“老路”。其外表特征，即伍皓指出的“沉默”。其实这人为制造下的沉默也令人紧张。如今，“网络暴民”不值一提了，真有威胁的“现实暴民”却不时亮相，而这些危险分子中不乏“因堵而险”之人。许多人对“官民沟通”的希望破灭，于是换了一种“非理性”的表达宣泄方式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，“老路”的凶险性质得以充分暴露。

因此，“官民沟通”如果有效，那可是一桩了不起的伟大业绩，因为这本身就是在弥补社会断裂、消解官民对立的大业上大见成效了。

当然，真正的“官民沟通”，绝非言语式、网络式的沟通方式所能胜任。“治本”的沟通意味着现实中的利益舍得、角色变更、民权到位，而这都是初步建立起权力制衡机制之后方能发生的事情。就眼下而言，承认在任何机制下都需要人群间沟通的现实性，同时怀抱理想，为有利于建立治本的“社会协商”机制而进行适时的“官民沟通”，当为民众之理性选择。

对民众而言，“讲真话”即他们对官员的最低要求，也是一条“忍耐沟通”的底线。如果体制框架真能让真话无法出笼，那么“官民沟通”就很难进行。这里需指出：本不存在“官民沟通”有无的问题，只有沟通的风度、气氛、方式问题；而免谈、不合作等拒绝对话沟通的举动，不过是戾气增多的另类沟通方式罢了。

以伍皓的例子说明，来自官方的沟通尝试很可能失败，不过，对这种失败也可视为“改革必要性的证明”。这不是任何一位官员的个人失败，而昭示了一个时代和体制转型的迫切性。 黎 明



决策失误该追究

刚刚公布的《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》，其中就有对“决策严重失误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”者实行问责的明确条款，让亿万同胞切实看到了党政干部今后减少重大决策失误、避免折腾的希望。人们有理由对此抱乐观态度。

吴之如 文/画

“北大的信誉”与“校长的品格”

今年的高考招生尚未结束，部分学校已经开始为明年的招生备战了。记者13日从北京大学获悉，目前该校正在酝酿2010年的自主招生政策，将在部分地区启用“校长推荐制”，四川已纳入试点讨论的省份。(《成都商报》7月13日)

校长推荐制度，在国外并不新鲜。譬如在美国，学生申请大学就必须提供两封推荐信，推荐人的身份、地位、声誉对学生能否被名校录取有较大影响。而在国内，近年来也有高校开始对“校长推荐制度”进行试水，从大的方向来看，这是一种教育进步，是教育管理者主动为之的教育探索，可以对现行单一考试考评机制构成有力的补充。

但在我看来，在当前的教育体制环境大背景下盲目推行“校长推荐制度”，不仅缺乏可控性和可操作性，还容易导致教育不公正。或者说，在应试教育体制下，将“北大的信誉”与“校长的品格”简单挂钩，具有太大的制度风险。

首先，大学施行“校长推荐”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吸纳优秀学生，给予综合素质高的考生一个“个性发展”的机会——可须知，推荐谁？推荐标准是什么？怎么推荐？谁来监督？能不能做到公开透明？一旦这样的“机会”由作为教育管理权力个体的校长所掌握，出现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的可能性就大得多。而事实上，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，“校长推荐”能否排除所有“人为因素”的干扰而全力保证公正与公平，实在是令人担忧。缺乏相应完善的监督和公共监督体系，以及一定水准的教育诚信环境，“校长推荐”很容易异化为新的教育作弊通道。

其次，某种意义上说，当下功利的教育考评机制也为“校长推荐”埋下了舞弊造假的伏笔。就像报道中川内一重点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所言：“如果全凭学校推荐，学校为了升学率，一般不会把最优秀的考生推荐成自主招生考生，而会用他们来冲刺高考状元。这对高校是不利的。”在“学校的利益”面前，“北大的信誉”可谓是一文钱不值，“校长推荐”的选择不言而喻。

高校自主招生，是高考制度改革的形式之一。改革的目的，是要打破“一考定终身”的评价体制怪圈，消弭体制落后所带来的不公，但不能由此造就新的不公，这必然是改革所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前提——换言之，改革的指向应是淡化教育权力对于教育的大包大揽，最大限度地剔除教育运作中的“人的因素”，强化制度可控管理的力量，把“北大的信誉”、将教育公平的保障寄希望于权力个体的道德自律，这种改革思路本身就值得商榷。 陈一舟

大师后继乏人忧思

钱钟书、费孝通、巴金……近些年来，每逝去一位民国时期即已名满天下的学人，人们都会在无限缅怀中感叹大师的凋零和后继乏人。季羡林先生的故去，则再一次让这个话题延续。

季老是全社会公认的大师。媒体评价说，季老辞得去国学大师的名号，却辞不去人们对他的尊敬。这不像时下某些人，虽被冠以大师的名号，却备受质疑。

在季老过世后，有网站登出“季羡林先生逝世之后，你觉得中国还有国学大师么”的问题，有近四成的人认为“季老逝世，中国再无国学大师”。

可见大师之难得，非寻常人，实在难以承载这名号。从每一位大师的成长历程看，也可谓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，历经传奇而成大师。

像季羡林，他出身寒门，后求学清华，有幸受到陈寅恪等人教诲。1935年留学德国后，恰遇二战，只好留德苦学，但这十年，他得以亲炙世界级梵文、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权威，他回国已成学术权威，被陈寅恪引入北大。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师的，却是他归国后的经历：先被关进牛棚批斗，后又被分配去看守门房，收发信件和报纸，然而，这段时间他却翻译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《罗摩衍那》，并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。

坎坷的经历中，季老为人为学都有足以传世之处。他的安贫乐道、贫贱不移、宠辱不惊让人称道。“未名四老”之一的张中行生前就曾在《负暄三话》中评价道：“季先生以一身而有三种难能：一是学问精深，二是为人朴厚，三是有深情。”而他后来以副校长的身份却被新生及其家长当成“老工友”而为他们守行李的故事，更为“永远的大师”平添了一段传奇。

张中行评价季老的三个“难能”，每一个在现时代都是稀缺之物。季老学问精深，源于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的为学信条，但在今天，这样的信条却早已被各种粗制滥造和学术抄袭、剽窃所淹没。而且，近来人们发现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中，还频频闪现出校长、院长和著名教授的身影。

而为人朴厚和有深情的为人之道，在当下，却滑向了一个可怕的方向。近日陈丹青在一个名为“中国梦”的论坛上有精妙的点评，那就是滑向了怎样做官。

可以想见，在这样的一种充满“官污染”的学术生态下，想要看到灿若繁星般的大师，几乎没有可能。一个真正的学人，只有避开浮躁和流俗，秉承前代大师的精气神，在坎坷中前行，在磨砺中坚持，在学问精深的同时坚守为人之道，也许慢慢的，他就成了大师。 叶铁桥